

Stevenson's Contradictory Writing and His Identity Dilemma in *The Beach of Falesá*

ZHOU Yuanyua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7, 2026

Accepted: July 1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ZHOU Yuanyuan. (2026). Stevenson's Contradictory Writing and His Identity Dilemma in *The Beach of Falesá*.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159–16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7>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Postgra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Project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3 (No. SISU2023YZ040).

Abstract: *The Beach of Falesá*, written by Stevenson in his last years, broke away from his traditional male-centered adventure stories and the prevalent imperial myths by presenting a white man's courtship of an indigenous woman and offering positive portrayals of her. Existing studies tended to examine the text from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yet failed to transcend the binary criticism framework of subversion and conspiracy. In particular, they failed to effectively illustrate the regression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where the white protagonist again falls into anxiety over finding white husbands for his mixed-race daughters. The question of "I'd like to know where I'm to find the whites" appears as the most valuable metaphor in this novel. This contradictory narrative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author's projection of his own experiences onto the colonial scene, with textual fissures serving as a self-articulation of his own identity predicament. In the political space of the beach as a "contact zone", the indigenous woman Uma achieves reversal of the colonial authority with her wisdom. This turning implies the resolution of colonial crisis requires resorting to the indigenous wisdom of the colonized, yet subtly maintains the hierarchical logic of imperial ideology. Through the intertextual weaving of the narrator and the author, the ending of this novel reveals Stevenson's core dilemma as a double exile, trapped in his longing for Home and the reality of compulsive exile. He attempted to seek identity expansion through writing and rebuild connections with Scotland, while the gap between the exiles and their belonging to the homeland could not be bridged.

Keywords: Robert Louis Stevenson; *The Beach of Falesá*; Interracial marriage; Contradictory writing; Exile identit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OU Yuanyuan (1994–), female, Ph. D. candidate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史蒂文森《法萊薩海灘》的矛盾書寫與身份困境

周園園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要：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晚年創作的《法萊薩海灘》突破其男性中心冒險敘事傳統以及普遍存在的帝國神話，罕見地呈現白人男性向土著女性求愛的情節，並對土著女性進行積極刻畫。現有研究多從後殖民視角加以探查，普遍未能超越顛覆與共謀的二元批評框架。尤其未能有效回應小說結尾的『倒退現象』，白人男性再次陷入為其混血女兒尋找白人丈夫的焦慮之中。『上哪兒為她們尋找白人丈夫』成為全書最為關鍵的隱喻。史蒂文森這一矛盾書寫是作者將自我經歷投向殖民地的觀看體現，文本裂隙恰是作者的自我言說。在海灘作為『接觸區』的政治空間，土著女性烏瑪以其智慧完成殖民權威的關係倒轉。在暗含殖民危機的解除需訴諸被殖民者的本土智慧時，又不動聲色地維繫了帝國意識形態的等級邏輯。史蒂文森將自身經歷與小說敘事者互文編織，小說結尾的矛盾詰問暴露出史蒂文森作為雙重流亡者的核心困境，自身對家園的渴求與無法回歸的現實焦慮互相撕扯。他試圖以寫作尋求身份擴展，重建與蘇格蘭的聯繫。但流亡者與家園歸屬之間的裂隙終究無法彌合。

關鍵詞：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法萊薩海灘》；跨種族婚姻；矛盾敘事；流亡者身份

一、引言

維多利亞時期航海與冒險故事題材正值鼎盛，波利尼西亞『天堂』和『失樂園』主題百多年來太平洋旅行寫作的主要元素^①。在這一傳統冒險敘事中，『他者』要麼處於衰落和野蠻退化之中，要麼淪為等待文明開墾的蠻荒之地。史蒂文森長期遵循這一維多利亞時代傳統，前期致力於男性中心冒險故事創作，也因長期塑造『呆板』女性角色或回避女性描寫而飽受詬病^②。然而《法萊薩海灘》脫離了『男性冒險故事的美化敘事以及《魯賓遜漂流記》中普遍存在的帝國神話』^③，它以南太平洋地區殖民者和土著的互動摩擦為背景，『首次對英國在南海的殖民行徑進行批評』。其中法萊薩島嶼被塑造為寓言空間與現實政治場域，以此質疑帝國佔領的正當性^④。這一小說甚至可視為康拉德《黑暗之心》的先聲^⑤。尤其關鍵的是，該小說罕見地呈現白人男性向土著女性求愛的情節，並對土著女性進行積極刻畫。作為『第一部現實主義的南海故事』，他跨越了『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化之間的界限，對文學與經驗、政治和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探索』^⑥。對於這一小說，史蒂文森自信地表示『如果你讀了我的小故事，你對南海的瞭解會比你在圖書館裏讀的書還要多』^⑦。

對於這一男性中心冒險敘事傳統以及普遍存在的帝國神話的突破，卻因小說結尾白人丈夫為其混血女兒發出的『上哪兒為她們尋找白人丈夫』這一詰問，使得批評界的觀點幾乎難以調和。一些論者認為其作品受制於『晚期維多利亞帝國話語』^⑧，另一些則從中發現了與康拉德小說相同的、對大英帝國的道德曖昧態度^⑨。學者萊恩漢強調，史蒂文森『虛構地呈現女性和愛情的品質』，將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隱匿於第一人稱敘事的面具之後^⑩，大英帝國鼎盛時期的『文化意識形態與性道德轉型期的精神陣痛』，在文本中留下既批判又複刻的矛盾印記^⑪。鑒於史蒂文森本人曾在書信中稱這一小說為『純正家庭小說』（sterling domestic fiction^⑫），史蒂文森研究著名學者羅斯林·喬麗（Roslyn Jolly）^⑬由此切入，強調該小說深層內核歸屬於家庭

小說這一女性文類譜系，將該小說中的跨種族婚姻去異域化為普通『家庭求愛式』關係。上述研究雖各有洞見，但闡釋並不充分。尤其小說結尾因威爾特希爾為其混血女兒發出的『上哪兒為她們尋找白人丈夫』這一詰問並未得到有效闡釋。既有研究中或輕描淡寫地略過，或將之簡單歸入『顛覆/共謀』的二元批評框架的框架。這一文本張力與作者熔鑄其中的複雜思考始終未能得到充分闡釋。

史蒂文森這一充滿張力的矛盾書寫恰恰是其創作的精妙之處，矛盾本身成為一種自我言說，成為理解史蒂文森晚期精神氣質的關鍵座標。史蒂文森以該小說作為反思蘇格蘭家園與流亡者自我的隱喻載體，經由對傳統異國情調話語的矛盾顛覆，凸顯自身身份困境。白人男性與土著女性的結合象徵著蘇格蘭高地與高地之間的隱喻性聯姻。作為終其一生漂泊的流亡作家，史蒂文森的身體經驗與小說中的白人丈夫處境形成了隱秘的鏡像關係。小說中土著妻子的『拯救』與白人丈夫的『依賴』可視作流亡者對失落家園的想像性佔有。通過書寫跨種族婚姻，史蒂文森實則是在書寫自己與蘇格蘭之間那場永遠無法完成的和解，試圖尋求『個人身份的擴展』與家園的聯結。

二、『接觸區』中智識博弈與權力倒轉

史蒂文森於太平洋的遊歷經歷讓其對南太平洋地區發生的貿易、傳教以及殖民互動都非常熟悉，這些互動的共同點在於它們的發展都依賴於『須穿過海灘』的事實，海灘成為西方意義上的貿易場所，同時也是薩摩亞與其他文化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混合文化空間^③。史蒂文森最初將該小說命名為《烏魯法努阿的高林》（*The High Woods of Ulufanua*^④），後修改為《法萊薩海灘》，史蒂文森有意將讀者的想像期待由南太平洋土著社會中心引向海灘這一帝國主義者與被殖民者互動的場所。米歇爾·埃勒雷^⑤進一步指出，海灘既是一個『可供跨越的文字空間』，也是一種『文化調整的隱喻』，西方人借此文化調整，在自身社會價值觀和等級制度與他必須在其中生存或獲利的社會價值觀和等級制度之間進行談判。

史蒂文森將土著女性烏瑪呈現為威爾特希爾探索土著社會的第一片『領地』，其形象與身體的描寫，與被探訪、被入侵、被發現的海灘形成呼應。海灘暗含著一種自我調整與逐步同化的過程，在這一相互影響，彼此同化的『接觸』空間中，雙方在互動中喪失了身份的純粹性，殖民權威因此面臨傾覆的威脅^⑥。威爾特希爾初到法萊薩，便在凱斯安排下『挑選床伴』，被烏瑪『只穿著一件濕透了的襯衫……介於貓和嬰兒之間』的形象所吸引^⑦。烏瑪的身體被塑造為極具性暗示的景觀，其身體成為殖民欲望的具體投射。然而，史蒂文森並未順應這一傳統殖民敘事，而是將其反轉。烏瑪對自身性吸引力的博弈價值有著明確的自覺。婚禮時她以精心設計的文化表演使其自身兼具西方女性的『高貴』與土著女性的『性吸引力』，『她穿戴整齊，身上散發著香氣；她的短裙（kilt）是用精緻的塔帕布製成的，褶皺間顯得比任何絲綢都要華貴；她那深蜂蜜色的上身幾乎赤裸，只戴著半打種子和花朵串成的項鍊；耳後和發間插著鮮紅的芙蓉花』。這種『既驕傲又謙卑』的儀態，不禁令威爾特希爾自嘲：『我這樣一位窮商人，根本就配不上她……她真像個伯爵夫人，盛裝要去聽音樂會』^⑧。即便如此，這一白人男性不時因其竟需通過欺騙方能獲取『床伴』深感愧疚，因這一行為傷害了其作為帝國代理人的高傲與自尊。反之，烏瑪對這一欺瞞一無所知，將該『偽婚姻證書』視若珍寶。

但其『無知』需要被重新審視，她有意識的展演無知與弱勢地位從而獲得合法化的婚姻，成功實現權力關係倒轉。在小說文本中，史蒂文森多次呈現發生在烏瑪與威爾特希爾之間的用混雜著土著語言的英語對話。當威爾特希爾的生意因凱斯的陰謀陷入絕境時，一位通土著語的法國傳教士試圖告知他凱斯與前任商人亞當斯的糾葛，卻因語言壁壘始終令其一知半解。其中一發音類似『fussy-ocky』的土著辭彙被反復提及。即便烏瑪提醒該詞意為『置之死地』（make dead）時，威爾特希爾仍認為『向當地人請教是一種恥辱』，並堅持認為凱斯是當地『唯一會說英語的人』。儘管威爾特希爾意識到烏瑪看起來『不像當地人，不像個土著女



人』¹⁹，卻有意識忽略自身與烏瑪英語會話的事實。回到最初那場不道德的婚禮現場，證婚的黑人牧師實際為『套著個大大的紙領子』的『江湖騙子』，他所誦讀的證婚詞不過是『某部小說的一冊殘卷，而他口中念念有詞的祝詞更是不堪入目，簡直不配形諸筆墨』¹⁹。威爾特希爾深感羞恥，卻未察覺烏瑪對英語的掌握足以令她識破這場騙局。她的沉默以及佯裝的無知實則是有意識的展演。她敏銳察覺威爾特希爾從信任凱斯到孤立無援，情感上逐漸向自身偏移的情感軌跡。初期以性吸引力的展演留住這位猶疑的白人男性；待其陷入孤立無援絕境時，卻主動坦白自身禁忌，選擇犧牲婚姻。『現在我走，禁忌也就跟著走了。然後你就能得到很多很多椰子幹了』¹⁹。這以退為進的姿態，在其孤立無援時刻賦予其男性權威幻覺，實則以此獲取了道德高地與情感主導權。更關鍵的是，於威爾特希爾而言，這一危機中的聯結提供的是替代性的『家園』幻象，她似乎是『這個陌生的地方』的『唯一的朋友』¹⁹。烏瑪成功將不可被接受的禁忌狀態轉化為白人男性主動求愛的現實，威爾特希爾向其告白『比起南海所有的椰子，我更願意擁有你』。烏瑪的回應極具象征意義，她『用島上特有的方式親吻著，把臉貼在我的臉上，我的臉上沾滿了她的淚水……她帶鹹味的淚水流入我的口中』。在常規殖民話語敘事中，土著女性身體通常為白人男性侵入，象徵著文明對野蠻的滲透與佔有。史蒂文森此時倒置這一傳統話語，土著女性的體液流入白人男性身體內部，白人男性從帝國代理人成為土著女性淚水與情感的接受者。所謂文明對野蠻的教化解構為『野蠻』對文明的滲透，從而預示了殖民秩序的傾覆可能。

在『接觸區』內，混血兒的產生意味著權力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²⁰。後殖民理論家比爾·阿希克洛夫特 (Bill Ashcroft) 曾在訪談中論及後殖民文學時強調，『殖民與被殖民、邊緣與中心都不是固有的存在方式，會隨著文化和政治關係的變化發生轉變』。²¹當威爾特希爾最終放棄回英國的夢想，選擇『留在海灘上與她生兒育女』。他從信誓旦旦要『帶來文明』的代理人轉向與被殖民地土著延續血脈，混血子女的出生暗含著身份純粹性的喪失，也意味著權力結構悄然完成了置換。羅斯利·喬麗曾強調冒險敘事中對種族間性行為後果的焦慮，實則為『憂懼白人會被有色人種吞沒』的不自覺承認，由『混血兒的出生導致的種族身份稀釋或喪失』下的『退化和滅絕』威脅²²。但威爾特希爾卻表態『我不喜歡離開孩子們』¹⁹。他借生育為紐帶，與土著社會締結更為深刻的情感連接，從此將自我逐漸轉化至『他者』的位置。喬利曾借用了希利斯·米勒的關於『宿主』的經典論述分析史蒂文森的跨文化敘事，捕捉到史蒂文森與太平洋文化之間那種既依賴又扭曲、既親近又疏離的曖昧關係。蘇珊·巴斯內特 (Susan Bassnet) 在《比較文學批評概論》中指出，『審視文化建構的深層內涵可能會暴露出看似無辜的代表性細節之下的潛臺詞』²³。在《法萊薩海灘》中，威爾特希爾反而在生活、情感乃至生存層面高度依賴這位土著妻子。而烏瑪以看似被動的姿態進入與威爾特希爾的婚姻，卻以其特有的土著智慧，悄然改寫了權利關係。最終經由體液交換與生育確認，殖民權威悄然傾覆。

三、訴諸土著智慧的殖民危機解除

史蒂文森賦予『原始』以更高的文明價值的立場在《法萊薩海灘》中得到具象化的呈現。他曾向西德尼·科爾文吐露：『南海最糟糕的事情是，白人的道德基調如此之低；當地人是唯一溫和的民族』。他讚譽波西尼亞人為『上帝最甜蜜的作品』，卻在當地的白人社群深感『格格不入』²⁴。於史蒂文森而言，『我愛波利尼西亞人：我們的文明如此骯髒，缺乏紳士風度；它摒棄了太多人性，尤其是那可憐生靈的真正美好之處』²⁵。這種對『不太文明』的原始性的嚮往與趨近揭示出史蒂文森關於殖民互動關係以及西方殖民行徑合法性的深入思考。該小說中，凱斯作為美、英、德三國於南太平洋殖民爭奪的化身，凸顯出帝國殖民行徑的欺詐與暴力。史蒂文森為凱斯安排的覆滅結局揭示出他對西方道德墮落的嚴厲譴責與深切自省。威爾特希爾從固守殖民者的傲慢，與白人凱斯為伍，到轉向烏瑪，選擇求助看似低於自身的無知土著，從而破除自身危險

卻不自知的困境。在與凱斯的最終對決中,他將烏瑪形容為如同『一張王牌』般的存在,肯定這一土著女性智慧對自身的啟發與幫助¹⁹。作為他者的土著智慧成為殖民者破解困局的關鍵,這一對土著智慧的推崇暗示史蒂文森對西方文明的『前進方向』在於『重視甚至學習他們竭盡全力摧毀的文化,停止這種向下的道德螺旋』的思考²⁰。

然而,史蒂文森對土著智慧的推崇並非沒有裂隙,拯救真正發揮作用實則仰賴於白人男性的意識轉變。威爾特希爾將烏瑪比作『一張王牌』的隱喻意味深長。作為牌局中的關鍵籌碼,在關鍵時機可以扭轉局勢。但終究身處牌局之內,博弈依舊仰賴上桌之人,而非『王牌』本身。也就是說,土著的智慧彰顯實則被框定於殖民者主導的博弈話語之中。烏瑪在揭露凱斯陰謀時恐懼地提起一則籠罩當地人的迷信故事:『吃卡納卡(kanaka)……凱斯一直是魔鬼兒子』,此外山中有頭半人半豬的怪物,『不能用槍殺死,因為有死者的靈魂』²¹。當地人均對凱斯在山上有被魔鬼阿圖(aitu)保護的秘密基地這一迷信信以為真並深感恐懼,遂從未靠近這一凱斯特意以之退避眾人,搗鼓自身營生之地。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威爾特希爾迅速識破這『哀號的聲音是由掛在樹枝上的伊奧利亞豎琴發出的,而那些奇怪的發光人物是塗了夜光漆的面具』,並譏諷地稱此處為『一家玩具店』,在英國『我們把這些東西給孩子們玩』²²。這一敘事安排的深意值得細究。表面來看,威爾特希爾成功破解凱斯的騙局。但羅伯特·凱利敏銳指出,這種『將嚴重威脅降低至兒童遊戲水準的傾向,比尋找一種能為迷團提供理性解釋的裝置的需求要深刻得多』。史蒂文森將凱斯的欺詐裝置變成『愚蠢的人工製品』。但恰恰是『當地人的恐懼、病態和無知』賦予凱斯這一人工製品權力²³。這種安排弱化了凱斯所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的罪惡形象,但卻暗含了一種對土著人群的愚弄與嘲諷。需要承認的是,史蒂文森未能徹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框架,土著社會的價值仍需經由西方人的發現與承認方能獲得合法性,發揮效用。他在批評殖民暴力的同時,又不動聲色地維繫了文明與野蠻的等級邏輯。

四、『上哪里為她們尋找白人』:互文編織下的身份困境與家園渴望

這一張力延伸至小說的戲劇性結尾。威爾特希爾忠於婚姻與家庭的選擇印證其對烏瑪為代表的土著社會的情感依戀與接納。他發出的『上哪兒去為她們尋找白人丈夫』的追問似乎與其對土著社會的選擇形成反例。『讓我煩惱的是女孩們……當然,他們只是半種姓;我和你一樣清楚,沒有人比我更瞧不起半種姓的人了;但它們是我的,是我的全部。我不能接受她們要嫁給卡納卡人,我上哪里為她們尋找白人娶她們』²⁴。是否威爾特希爾依舊被其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所困?是否這一跨種族婚姻浪漫敘事的溫情面紗最終被撕破,作者以此暴露出帝國意識形態的殘留?既有研究通常將之簡單歸入顛覆或共謀的二元批評框架,或在小說探討過程中對此輕描淡寫,一筆略過。威爾特希爾對混血女兒婚配困境的焦慮並不能簡單理解為帝國意識形態的簡單倒退,這一文本張力與創作者複雜且滿載張力的意識形態緊密關聯,始終未能得到充分闡釋。威爾特希爾的詰問深層指向為其對流亡者身份困境的清醒認知。這一焦慮在史蒂文森與威爾特希爾的互文編織中,顯現出更為複雜的維度。

史蒂文森將自身經歷融入角色創作,使威爾特希爾成為其流亡經驗的投射載體,二者互為鏡像。史蒂文森曾在《在南海》中記錄本人登島時親歷的『圍觀』與『驚懼』體驗:『我與夫人及船上的廚師一同登岸……就在那樹梢之間,赫然坐著一土著,如神像般紋絲不動,注視著我們』。想到也許時刻處於監視之中,令其感到『一陣寒意』。但事實是,這些如『神像般』靜止的土著正在私下從事『為法律所禁的棕櫚酒採集,當風驟然將之暴露,他們無疑更為惶恐』²⁵。這一經歷被融入威爾特希爾的刻畫當中。與烏瑪成婚後,房屋周圍總是被『十幾個年輕人和小孩半圍著』,他們總是『默默靜坐』,如同『獵犬一樣直勾勾地盯著我和我的房子』²⁶。與史蒂文森類似的是,這種凝視恰恰源於他自身所引發的、當地人對他的恐懼。當他走進教堂時,正在禱告



的牧師『突然抬起頭,對上了我的目光』,隨即『他在講道壇裏踉蹌了一下;他的眼睛瞪得幾乎要跳出眼眶』,於是『佈道就這麼戛然而止了』。威爾特希爾曾三次鄭重強調其『白人和英國臣民』(white man and British subject)的身份,並以高傲的姿態宣稱『我到這兒來是為了給他們帶來好處,給他們帶來文明的……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們,我作為一個白人、一個英國臣民,要求他們給出如此對我的理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subject』一詞已然暗示了他在英國本土的底層地位,始終處於『臣服』或『下屬』的狀態。事實也的確如此。這個在殖民地高揚文明旗號的英國人,在英國實際居於那『終究是個骯髒、寒冷、泥濘的洞穴,光線暗得連看書都不夠』的地方。他不斷於殖民地的種族秩序中尋求虛幻的優越,試圖抓取致富的一線生機。但他賴以生存的椰子生意,也證實了其並無從商資本,唯有依託於南太平洋本土的物質資源的方能維繫的現實。即便他對烏瑪告白聲稱『比起南海所有的椰子,我更願意擁有你』。這一比較級的使用看似凸顯椰子和烏瑪非此即彼的對立。但事實在於,他恰恰是在烏瑪的幫助下,紮根土著社會,才真正擁有了『南海的所有椰子』。威爾特希爾的形象逐漸清晰。他是一個於宗主國與殖民地均處於邊緣的位置。『上哪里為她們找到白人』這一焦慮顯現出其對自身邊緣身份困境的清醒認知。他仍處於懸隔的『邊界位置』,無從獲得真正的家園歸屬。威爾特希爾對混血女兒的憂懼,則成為這一焦慮的投射。

通過敘事者與作者之間的互文編織,史蒂文森傳達出自身與威爾特希爾相似的處境與隱秘渴求。恰如史蒂文森,作為『不由自主的流亡者與家園的眷戀者』的矛盾結合體^①,史蒂文森在創作這一小說期間,因身體原因不得不定居於南太平洋,在與蘇格蘭地理距離愈加遙遠之時,『無子嗣』的現實令其意識到個人生命中最為劇烈的斷裂,甚至只好『帶著某種克制的驚懼不去展望未來』。這一自述源自其對完成《退潮》後轉向家族史寫作《北方之光:一個工程師家族的回憶》的回應。1892年,他坦言此舉『不是愛、不是驕傲、不是欽佩,這是身份的擴展……也許對我這樣一個無子嗣人來說,帶著某種克制的驚懼不去展望未來』^②。史蒂文森實則在坦白自身面對身份斷裂的深層恐慌。對於不得不流亡海外的作家而言,沒有生物學意義上的後代延續身份與血脈。這種斷裂意味著其無從得以與家園產生連接,身份失去根基。因而他試圖以家族史寫作探索身份擴展的替代性方案。但其家族史寫作未能完成的現實揭示出這一努力的失敗與絕望。正如小說中,威爾特希爾混血後代的存在恰恰印證了其文化歸屬陷入不可解的困境。『上哪兒去為她們尋找白人丈夫』暗含的是其對家園的渴望與無法回歸的現實焦慮。史蒂文森越是試圖通過寫作重建與蘇格蘭的聯繫,越能證明其對回歸家園與尋求自身定位的渴求與困境。流亡者與家園歸屬之間的裂縫無法得到彌合。

在這一基礎上,威爾特希爾與烏瑪的聯合具備作為蘇格蘭本土作家的現實關懷。史蒂文森的成長背景與旅行經歷賦予其獨特視角,關注薩摩亞群島尤其是馬克薩斯群島的土著處境時,強烈喚起他對受壓迫的蘇格蘭高地命運的聯想。珍妮·考爾德敏銳捕捉到史蒂文森的分裂認同:『作為低地人的史蒂文森,於高地人而言,是一個「侵略性的殖民者」;但作為蘇格蘭人,他是英帝國主義的受害者』^③。該小說描述烏瑪的穿著時,曾三次強調其身著『kilt』的細節。『kilt』不一定必然指向傳統的蘇格蘭呢子裙服飾,但生長於蘇格蘭且熟知蘇格蘭歷史的史蒂文森,必然知曉這一辭彙暗含的文化意義。它最早為高地人特有。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末,因高地氣候陰冷潮濕,高地人平時靠一件披肩裹成的蘇格蘭長裙禦寒,在低地人看來簡直難登大雅之堂。1745年詹姆斯黨人叛亂被鎮壓後,《禁裙令》頒發,蘇格蘭人不得再穿格子呢衣服,英格蘭政府在同化蘇格蘭低地社會的前提之下,對高地詹姆斯黨進行暴力鎮壓,以此摧毀高地氏族的文化認同^④,蘇格蘭裙成為高地抗爭命運的象徵。史蒂文森在《在南海》中明確將兩地並置:『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年輕時對蘇格蘭高地和這些島嶼均有所瞭解。不到一個多世紀,這些地方和今天的馬克薩斯群島一樣,處於動盪和過渡的狀態……在一個地方,人們珍愛的紋身被禁止,在另一個地方,人們珍愛的服裝被禁止……那些馬克薩斯酋長們的驚慌和突然的會議,不斷地使我想起拉瓦特和斯特魯恩的日子』^⑤。烏瑪身著『kilt』的細節,也許是史蒂文森精心植入的文化符號。威爾特希爾與烏瑪的結合,可被視為蘇格蘭低地與高地之間的隱喻性聯



姻。當面對共同敵人的二者選擇彼此聯結、互相信任，從而在被動局勢下轉危為安，可視作史蒂文森以隱喻方式對蘇格蘭民族內部和解的思想投射，一種對高地人示以同情以及對英國殖民的詩性抵抗方式。這一解讀可在史蒂文森書信及後期同時期創作中找到論據。據史蒂文森自述，『法萊薩與 D. B (David Balfour) 比以往任何都更接近我的意思，更接近我想通過小說表達的東西。在這之前，最接近的是《誘拐》』^⑦。《誘拐》以 1745 年詹姆斯黨人叛亂為背景，講述低地孤兒大衛·巴爾福與高地詹姆斯黨人艾倫·佈雷克結伴逃亡、最終奪回繼承權的故事；其續集《卡特裏奧娜》則聚焦大衛與流亡詹姆斯黨人女兒卡特裏奧娜的結合。該作同樣以積極女性角色為核心，並以高地與低地主人公的結合象徵象徵充滿齟齬的高地與低地的和解與團聚。史蒂文森將《法萊薩海灘》與這些蘇格蘭主題小說並置，暗示它們指向共同的核心關切，即流亡者對歸屬的永恆追尋以及民族和解的可能，另一種意義上的歸家的可能。

五、結語

『多麼奇妙啊，我竟以這般方式徹底踐行了蘇格蘭人的宿命，甘願流放異鄉，腦海中卻無時無刻不被那令人眷戀又惱人的故土縈繞』^⑧。《法萊薩海灘》突破了男性中心冒險敘事傳統以及普遍存在的帝國神話，罕見地呈現白人男性向土著女性求愛的情節，並對土著女性進行積極刻畫，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互動中權力關係悄然顛覆，構成了一幅殖民地『接觸區』的複雜圖景。史蒂文森以此打破傳統殖民敘事後，又以白人男性對其混血女兒的婚配詰問撕破跨種族婚姻浪漫敘事的面紗。這一矛盾書寫對創作者史蒂文森的身份困境進行言說。他將威爾特希爾塑造為鏡像式的雙重流亡者，於本民族與殖民地均處於邊緣位置，無從獲得穩定的身份，從而實現與家園的聯結。烏瑪身著『kilt』的細節、威爾特希爾與烏瑪的隱喻性聯姻、以及混血女兒不可解的婚配現實，共同構成史蒂文森與蘇格蘭之間那場永遠無法完成和解的書寫。『上哪兒為她們尋找白人丈夫』成為全書最具穿透力的隱喻，成為所有試圖在邊界位置尋求或建立『家園』者的根本困境體現。

注釋

- ① 史蒂文森在信中解釋道：『Ulufanua 是一個美妙的薩摩亞詞匯，意味着森林的最深处』（Stevenson, Vailima Letters, Letter 78）。

參考文獻

- ① Ann C., Colley. (2004).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nd the colonial imagination*.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 ② Anne, Maxwell. (2013). Building friendships: "Civility" and "savagery" in R. L. Stevenson's "*The Beach of Falesá*" and "*The Ebb-T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ottish Literature*, 9, 38-50.
- ③ Barry, Menikoff. (1984).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nd "The Beach of Falesá": A study in Victorian publishing with the original tex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④ Claire, Harman. (2006).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 biography*.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 Sydney: Harper Perennial.
- ⑤ David, Daiches. (1973).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nd his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⑥ Ian, Bell. (1992). *Robert Louis Stevenson: Dream of exile*. Edinburgh: Mainstream Publishing Company.
- ⑦ Jenn, Fuller. (2016). *Dark paradis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imagina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⑧ Joseph C., Furnas. (1951). *Voyage to windward: The life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 ⑨ Katherine, Linehan. (1990). Taking up with Kanakas: Stevenson's Complex Social Criticism in "the Beach of Falesá". *English*



-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880–1920, 33(4), 407–22.
- ⑩ Katherine, Linehan. (1997). Revaluing women and marriage in Robert Louis Stevenson’s short fiction.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880–1920, 40(1), 34–59.
 - ⑪ Mandy, Treagus. (2014). Crossing “The Beach”: Samoa, Stevenson and “The Beach at Falesá”. *Literature Compass*, 11(5): 312–320.
 - ⑫ Michelle, Elleray. (2005). Crossing the Beach: A Victorian Tale Adrift in the Pacific. *Victorian Studies*, 47(2), 164–173.
 - ⑬ Patrick, Brantlinger. (1988). *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⑭ Richard, Ambrosini, and Richard, Dury. (2006). Introduction. *Robert Louis Stevenson, Writer of Boundaries*, xiii–xxvii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⑮ Robert, Kiely. (1995).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nd the fiction of adven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⑯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99). *The letters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 to his family and friends, Volume II*. Sidney Colvin (ed.). London: Methuen and Co.
 - ⑰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912). *Vailima letters: Being correspondence addressed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to Sidney Colvin*. London: Methuen & Co. Ltd.
 - ⑱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971). *In the South Seas*.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Samoa.
 - ⑲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996). *South Sea tales*. Roslyn Jolly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⑳ Roslyn, Jolly. (1999). Stevenson’s “Sterling Domestic Fiction”: “The Beach of Falesá.”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50 (200), 463–482.
 - ㉑ Roslyn, Jolly. (2004). South Sea Gothic: Pierre Loti and Robert Louis Stevenson.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880–1920, 47(1), 28–49.
 - ㉒ William, Gray. (2004).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 literary lif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㉓ 蘇珊·巴斯奈特(著), 查明建(譯):《比較文學批評導論》,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
 - ㉔ 張麗麗:《跨文化書寫與後殖民文學研究——比爾·阿希克洛夫特教授訪談錄》,《外國語文》, 2023 年第 39 卷第 2 期, 頁 83–89。

(Editors: LIU Rong & LI Ruobing)